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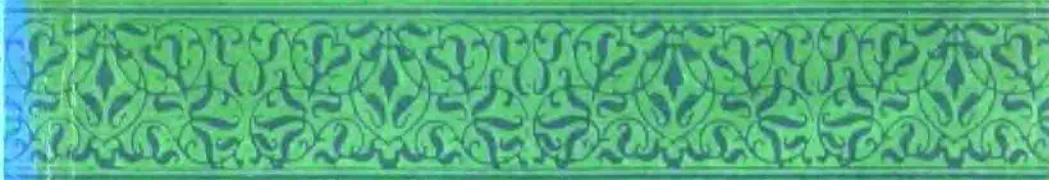
广东文化名人录之二

广东文史资料 第64辑

成才之路

9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广东文史资料第六十四辑

成才之路

——广东文化名人录之二

主 编：丁身尊

副主编：林亚杰

817713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文史资料

第六十四辑

成才之路

——广东文化名人录之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75印张 155,000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册

ISBN7—218—00551—9/K·123

定价2.70元

前 言

去年，我们编辑出版了《群星璀璨——广东文化名人录》一书，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我们又向大家献上这本《成才之路》，作为它的续篇。

在本书里，我们选编了近现代广东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13位著名人物的传记、传略或事迹。他们当中有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学家和著名新闻工作者。他们的出身各自不同，经历也千差万别，但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却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他们几乎都出过洋，都曾抱着试图以自己所学的专业，实现救国的愿望。经验证明：走“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医学救国”之路是行不通的，或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他们在历尽磨难之后，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经过不懈奋斗，从而真正实现了他们的理想与追求。

当前，我国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我们觉得让青年人了解他们的前辈所经历过的艰辛苦难、曲折坎坷的道路，和沐浴在阳光下的欢欣喜悦。可以从前辈所走过的成才之路中得到启示，受到教益。

广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得风气之先，群英

荟萃，人才辈出。涌现出象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活动家；也有一大批才华横溢、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他们的感人事迹很值得我们去赞颂，他们的高尚品质很值得人们去发扬，这是我们编写广东文化名人录的宗旨。我们将继续把这项工作下去，也希望广大读者给予大力支持。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书中定有不足之处，敬希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

1990、6、14

目 录

前言 编 者 (1)

杜国庠传略 黄学盛 熊泽初 (1)

哲人不萎

——纪念杜国庠同志诞辰 100 周年 杨应彬 (21)

卓越的学人和忠厚的长者杜国庠 秦 牧 (25)

杜国庠革新金山中学校政始末 罗道证 (31)

✓ 烽火年代的足迹

——杜埃早期事迹记 林亚杰 吴春泉 (40)

为人民报业献身的邬维梓 林 铃 (65)

风雨南洋历艰辛

——记胡伟夫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 昭 明 (79)

○ 詹安泰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 洪楚平 (92)

洗玉清教授传略 黄任潮 (103)

忆念戴裔煊教授 关履权 (125)

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 谭 河 (132)

振兴中国人类学的先行者——梁钊韬 陈启新 (143)

地理学家吴壮达教授彭立勋 (165)

林砺儒在广东文理学院二三事.....阮镜清 (179)

记教育家、药理学家罗潜教授.....陈兴邦 (185)

心灵的探索者

——记教育心理学家阮镜清教授

.....莫 雷 王秀民 (196)

杜国庠传略

黄学盛 熊泽初

杜国庠是老一辈的革命活动家，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优秀共产党员，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一

1889年4月30日，杜国庠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莲阳乡兰苑村。父亲杜建珪是晚清秀才，以教书的束脩养家糊口。杜国庠5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生活更加困苦。幸嫡娘勤劳慈惠，省吃俭用，使他得以在7岁进入私塾，受到了严格的启蒙教育。

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为争夺我国东北爆发战争。腐朽的清王朝任由豺狼蹂躏国土而宣布中立。15岁的杜国庠对此深感痛心。他在一篇策论里，极力主张彻底收回东北主权，表达了强烈的民族感情。私塾先生的友人吴冠英（后改名吴贯因，别号柳隅），具有爱国爱民思想，他看了杜国庠的文章，极为赞赏，主动提出要杜国庠到他那里免费就读。

在柳隅先生的指导下，杜国庠开始接触到当时上海出版的报纸杂志，受到新思想的启迪，眼界渐为开阔。不久，柳隅把他带

到县城，参加专为考生补习算学的传授班学习。

1907年，学业成绩优异的杜国庠，得杜氏大宗祠及邑同善祠的资助，前往日本留学。到东京后，杜国庠先参加了短期的日语补习。1908年，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普通科。具有民主思想的杜国庠，非常关注日本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活动。他在吴冠英编辑的《宪政新志》上，发表了《咨议局记事》、《列国国产税制度概要》等多篇文章，为各省咨议局参政提供资料。1910年2月，他试译了日本法学博士美浓部达吉的《耶里匿克氏宪法变化论》，登载在《宪政新志》第六号上，这是杜国庠的第一篇译作。

1912年，杜国庠考进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16年9月，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学制3年。这期间，清王朝虽已垮台，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是军阀割据，民不聊生。身居异国的杜国庠，心忧社稷，积极参与当时的进步社会活动。1916年，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复辟帝制，全国人民群起声讨。杜国庠与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1913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等人，在东京筹组丙辰学社，进行反袁斗争。

在日本留学期间，杜国庠兴趣广泛地涉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字学、佛学、因明学（印度逻辑）和哲学。这些，为他后来研究古代思想史打下了基础。但是，一切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方法论，都不能使他满足。1916年9月，杜国庠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在帝大的第一年，他有幸聆听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博士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写下了学习《资本论》的读书笔记。在初步认识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尤其是学习了作为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后，才使他多年所探求的方法论问题，得到解决。从此，确立了从事革命运动和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生道路。

留学期间，杜国庠结识了先后赴日留学的郭沫若、彭湃等人，共同的革命志趣和执着的学术追求，使他们成为挚友。在东京，杜国庠还曾同赴日求学的周恩来（1917年9月到日本，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1919年4月回国）几度会晤，彼此间建立了可贵的革命情谊。

二

1919年7月，杜国庠在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取得经济学士学位。回国后，经李大钊介绍，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政党论、社会政策、工业政策等课程。还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平民大学等校兼课。

杜国庠在北京期间，曾和平民大学的教师李春涛等，合住在地安门内慈慧殿南月牙胡同18号“赭庐”。就在这个小天地里，杜国庠组织大家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来往“赭庐”的那些人中，有国会议员胡鄂公、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周鲠生、广东早期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彭湃等。

1924年春，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逝世。杜国庠参加了在北大法学院举行的追悼大会。会后，他在和李春涛、邝摩汉等创办的《社会问题》杂志中，编辑出版了纪念列宁专辑。杜国庠在该刊上发表了题为《列宁与第三国际》的文章，热情洋溢地讴歌了列宁和他所建立的第三国际的伟大功绩。

1925年春，杜国庠深感当时的北京大学，风气腐败，非栖身之所，便乘奔母丧之机，辞去一切教职，回到了家乡澄海县。

三

1925年6、7月间，澄海县立中学校长辞职，校董会一致公推杜国庠继任。8月，正式到校视事。他首先着手的一件事，便是破除封建礼教的陋规，破例招收了吴文兰等6名女生，开创了男女同校的新风。他支持进步教师李春蕃（即柯柏年，当时已是共产党员），带领高年级学生，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海丰县参观学习。还亲自组织进步师生到城西的基督教堂，现场揭露帝国主义利用传教自由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向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是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胜利进抵潮汕，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出任东江各属行政公署委员，主管东江（辖潮汕、梅县、惠阳三地区）20余县的政务。杜国庠奉周恩来之命，改组了国民党澄海县党部，使左派势力大大加强。

杜国庠领导澄中的半年中，锐意改革校政，让学生走出校门，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造就了不少革命人才。在招收的6名女生中，有5名不久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其中的吴文兰，1926年擢任中共汕头地委妇委书记、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汕头分会会长，成为潮汕妇女运动的著名领导人和组织者。还有曾经担任中共澄海部委书记（后改称县委）的林灿，曾任东江特委副书记和广州市委书记的杜式哲等。

1926年12月，潮汕地区的金山中学发生了进步师生驱逐反动校长黎贯的风潮。杜国庠奉周恩来主任之命，接任金中校长。他大力整饬校政，撤换反动教员，彻底清理被校董、绅士左右的金中积欠校产，组织学生轮流下农村参加农民运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4日深夜，汕头、潮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跟着行动，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国庠幸得一位工友报讯，才免遭毒手，避匿乡间。

9月下旬，南昌起义军进驻潮汕。杜国庠立即赶到汕头会晤周恩来和郭沫若。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他毅然提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他恳切地向周恩来表示：“目前是革命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应吃苦，我希望党允许我加入，给我更多的教育。”周恩来高兴地答应提交汕头市委讨论，并准备让他出任建立革命政权后的潮阳县县长。

由于军事形势急转直下，起义军在潮汕很快遭到失败。杜国庠随总指挥部撤出汕头，在普宁县的流沙镇附近被敌军冲散，辗转到了海丰境内。当地农民听说他是彭湃的朋友，热情地加以接待和安排。10天后，用小船把他送往香港。

四

1928年1月，杜国庠到了上海，2月，由钱杏邨（阿英）、蒋光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他在我国文化战线上，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顽强地奋斗了一生。

一到上海，杜国庠便投身于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他参加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又和洪灵菲、戴平万等组织“我们社”，创办《我们》月刊。从1928年初到1930年中的两年多时间里，杜国庠着力于革命文艺理论的研究和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翻译。在文艺理论方面，他选择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底基础》、柯根的《无产阶级文学论》、《理论与批评》

和藏原惟人的《到新写实主义之路》、《普罗列塔利亚艺术底内容与形式》等。翻译的小说，主要是当时日本的左翼文学作品。先后编辑成册的有《一束古典的情书》、《俘虏》、《废人》等。

在1929年3月23日出版的《海风周报》第十二号上，发表了杜国庠的《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这是一篇论述文艺大众化的论文，该文提出了“大众化”、“新写实主义”、“艺术运动的二重性”三个问题，批判了当时的一些错误言论。

杜国庠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同时，并没有放松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译著和研究。也就是在这几年间，他用林伯修、吴念慈、林柏等笔名，翻译了德波林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亚克色利罗德的《社会学底批判》、雅各氏莱夫的《普列汉诺夫论》、佐野学的《旧唯物论底克服》、《无神论》，还翻译了《金融资本论》。这7本书，洋洋80多万字，分别由上海南强书局、晓山书店和创造社出版部出版。此外，杜国庠还和柯柏年合译了乌连诺夫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又同柯柏年、王慎名（王心民）合编了《新术语辞典》和《经济学辞典》。这些重要译著和辞书的出版，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知识青年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起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1929年秋，我党为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直属中宣部领导。杜国庠是文委成员之一。文委成立以后，立即筹组左联。他积极参加了这方面的活动，出席了1930年3月2日召开的左联成立大会。随后，他按照党的指示，于1930年5月与潘梓年、邓初民等发起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并参与社联党团的领导工作。

随着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开展，继左联、社联之后，又

成立了剧联、美联等左翼组织。在此基础上，党又成立了一个公开领导这些群众团体的机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实际上，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左翼文化总同盟，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文委成员之一的杜国庠，也是文总的一位负责人。

1931年初春，在二十五路军梁冠英部担任总参议的著名共产党员宣侠父，到上海找左联的负责人，要求派一位同志到军中协助他做政治思想工作。文委认为，杜国庠是搞社会科学的，又是一位极为细心的人，肩负此任最为合适。于是，杜国庠化名林伯修，随宣侠父到二十五路军驻地淮阴，在梁冠英军中办起了社会科学研究室，经常组织进步军官学习《社会科学讲话》等书籍，传播革命影响。1932年初夏，蒋介石命令二十五路军进攻鄂豫皖苏区。宣侠父极力劝阻梁冠英无效，愤然离军。杜国庠也因之回到上海，继续参与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工作。

在此后的几年间，杜国庠把全副精力放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和对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培养上面。他先后参加了文总的机关刊物《中国文化》和《正路》的审稿工作，还经常为《研究》等刊物写稿；他通过由陈卓凡出资，以王鼎新为经理的南强书局（陈、王都是澄海县人，留日学生），出版了许多社会科学丛书和进步文学作品。南强书局的出版计划和稿件，多由杜国庠审定。许多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和作家，如邓初民、柳岛生（杨贤江）、吴黎平、李达、沈端先（夏衍）、钱杏邨等的著述，多由南强书局出版发行。他经常参加一些大学和工厂组织起来的学习小组和读书班的活动，孜孜不倦地指导他们学习。许涤新回忆说：“杜国庠经常出席我们所组织的读书会。他要我们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作为学习的主要读物。但是，我们对恩格斯在书中所提出、所发挥的问题，总是搞不清楚。而杜国庠呢？总是耐心地给

我们解释。因为工作忙，来不及吃饭，他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时，经常买两个包着玻璃纸的小面包，一面吃，一面讲解。”

杜国庠是一位独具慧眼的“伯乐”，他能发现“千里马”，并为其架设通往成功之路的桥梁。艾思奇即其一例。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27年和1930年曾两度赴日求学，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学有所成。1932年在上海泉漳中学任教期间，开始以“思奇”、“李东明”等笔名，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哲学短文。1933年夏，文总负责人杜国庠到泉漳中学了解斗争情况。发现他思想活跃，学习勤奋，有较好的理论基础，认定他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应该发挥他的长处。于是，便派社联的蔡馥生与他联系，将艾思奇的关系转到社联，使他有了充分的时间研究哲学，不久，艾思奇由杜国庠和许涤新介绍，正式加入社联，并担任研究部的工作。从此，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和著述上，努力奋斗了一生，成为我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除参加文委、文总和社联的领导工作外，杜国庠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干事，参与党的机关报《红旗日报》的编辑工作。

五

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成立了上海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派出机关，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

从1933年底至1935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上海中央局三次遭到敌人的大破坏。在1935年2月19日的第三次大破坏中，杜国庠与文委阳翰笙一起被捕，在其他地点同时被捕的，还有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文委田汉等36人，关押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

经过多年地下斗争锻炼的杜国庠，对于敌人的搜捕，早已有

了思想准备。他说：“当被捕的那一刹那，有十几分钟为了编口供而着急。准备好了，便觉泰然，转而生起瞧他们把我怎样的好奇心。这时，我那些英勇牺牲的学生如吴文兰等，也浮现在我的眼前，觉得我应该对得住他们。因此，我除了写姓名——吴啸仙（被捕后用这个名字，因为我曾用这个笔名译过一本书，准备万一被捕时用的），打指模之外，什么也坚决不写，不承认是共产党员。”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警方提审犯人，杜国庠在走廊下与田汉相遇，彼此才知道对方被捕。杜国庠深情地凝望着田汉，并在他手心上写了“坚决”二字。这两个字，既是对自己斗争意志的表白，也是对田汉的勉励。田汉会意地点点头，于狱中填下《虞美人·狱中赠伯修》一阕，以表达自己的心声和回报杜国庠对他的激励。

不久由于叛徒告密，警方知道了杜国庠就是有名的文人林伯修，便伪装客气，说只和他谈“政治”，不谈“关系”。杜国庠针对敌人的心理，决定以缓对急、以笑对怒、以柔克刚，用打太极拳的策略来对付敌人。在审问中，敌人多次进行反动宣传，妄图使杜国庠改变观点。杜国庠说：“我40多岁了，要改变自己的气质，怕也要30年吧，急是急不来的。”言词诱说无效，敌人遂以用刑进行威胁。杜国庠微笑着回答：“吃苦头也不算什么，打到发昏，便不觉得痛了。”当敌人恼羞成怒、大声叫骂时，杜国庠便以轻蔑的冷笑对之说：“权在你们手中由你，假如在我们手中便由我，杀便杀，发脾气对于彼此都不合卫生。”

3月17日，杜国庠被调到另一囚室。这天，正是巴黎公社革命64周年前夕，同室难友知道他是林伯修，就请他做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为了鼓舞士气，杜国庠高兴地答应了。3月18日上

午，他以巴黎公社的报告结束了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囚禁生活。当天深夜，在滂沱的大雨声中，与黄文杰、朱镜我、田汉、阳翰笙等8人，一同被解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后在这里被关押了5个多月。

1935年初，杜国庠又被解往苏州反省院，在那里关押了将近两年时间。苏州反省院把杜国庠、李初梨、彭康、章汉夫、廖茂华、丁瓚、李默农等20多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编在“研究班”，要他们研读三民主义和陈立夫的《唯生论》。指定杜国庠要写出研读《唯生论》的论文。杜国庠趁机要求院方购买包括唯物论著作的日文书作参考。院方只给了几本就不给了，却一再催索论文。杜国庠拖了一年多，才交出一篇题为《中国哲学上对于“生”的看法》的文章，有3万多字，其中十分之九写的是中国唯物论哲学关于“生”的看法，十分之一照抄《唯生论》的某些词句。院方训育科长梁某看后质问：为什么不加评论？杜国庠说：“《唯生论》实在是经不起批评的，依我看还是这样的好。如若批评，势将体无完肤。”

杜国庠在苏州反省院后期，国民党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前来探望。刘某也是潮汕人，杜国庠在金中当校长时，他任潮安县长。刘某劝杜国庠“写点东西，表示悔意。”杜国庠说：“我要是愿意写东西，早在南京就出去了。而且，我无过可悔，更不愿意驱壳出去而把灵魂留在院内。”

1937年6月12日，杜国庠结束了两年多的狱中生活，终于重见天日了。恰巧在他出狱的那一天，阿英从上海来苏州买书，两人在路上相遇，彼此喜欢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阿英告诉他，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安事变后，经过我党斗争，国民党同意释放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同意实行共同抗日。杜国庠这才明白了释放他的真正原因。